

《左傳》接受與貞觀視角

——以《群書治要》截錄“華元食士”爲例*

張瑞麟 林朝成

提 要

貞觀五年魏徵等人編纂《群書治要》，該書究竟有無思想內涵？如果有，應該如何把握？根據序文，魏徵意圖編纂一部不同於《皇覽》、《遍略》，講求文義、見本知末、治國理政、合時可用的經世群書文本。因此，如何從截錄自古籍的文句，挖掘出蘊含編纂者詮釋的敘述，致用就是問題的關鍵。本文挑選《群書治要·左傳》裏的一則記載——“華元食士”，以此爲切入點，透過文脈的分析與語境的掌握，明晰《群書治要·左傳》蘊含異於《左傳》的視角與意義。文分三大部分，一者，以經典還原的方式，掌握《左傳》取捨先後面貌，以爲詮釋基礎；二者，透過掌握“華元食士”記載的歷史解讀，定位唐代解讀的取向；三者，說明“羊斟敗國”到“華元食士”評價觀點的異同，以及透過《貞觀政要》的語境外證與《群書治要》編纂意圖的內證，彰顯此思想的內涵。經過以上的分析，藉由“華元食士”敘述取向關注“恩結人心”的情感、重視“屈己得人”互動的人際經營，顯見《群書治要》擁有反映時代的思想特色，“以編代作”的詮釋意圖，所以持續從文本的比對與詮釋，拓展《群書治要》的思想研究有其重要性。

關鍵詞：群書治要 華元食士 貞觀政要 左傳 魏徵

* 本文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群書治要》視野下的儒道思想：以《貞觀政要》爲基底的應用詮釋”(MOST109-2410-H-006-111)之部分研究成果。承蒙三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特申謝忱。

一、前 言

學術研究想要突破,通常需要新材料、新方法或新視角的支持。以流傳的狀態而言,貞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魏徵等人編撰《群書治要》¹成書,深得唐太宗的讚賞,在唐皇宮與王府流傳,成爲君臣共議的治國思想寶典。直至宋代王應麟《玉海》始見散佚不全的說法,²根據金光一的推測,元初時《群書治要》可能已經徹底在中土消失了,³必須等到清嘉慶時才從日本回傳,所以從該書的重要性的研究的深廣度尚待拓展來說,仍可稱得上是研究的新材料。

魏徵等人在《群書治要序》裏提到:“今之所撰,異乎先作,總立新名,各全舊體,欲令見本知末,原始要終,并棄彼春華,采茲秋實。”很清楚的表達了編撰的意圖有三:一是,不同於《皇覽》、《遍略》的類書型態;二是,文義講求完整,要能見本知末;三是,不要繁文虛飾,要能合時有用。⁴不過,如《舊唐書》、《新唐書》將之置於子部的雜家類,《宋史》將之劃入子部類事類,顯見該書的定位隨時而變。學界多以類書視之,研究方式採文獻學的角度切入,目前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舉如嚴靈峰《定州竹簡〈文子〉殘本試探》、⁵吳金華《略談日本古寫本〈群書治要〉的文獻學價值》、⁶金光一《〈群書治要〉研究》、⁷林溢欣先後

-
- 1 《群書治要》的書名略有不同,有名“政要”、“理要”,據魏徵等人所撰序文,當以“治要”爲是。島田翰以爲避高宗諱改治爲理,又改爲政。見氏著《古文舊書考》(臺北:廣文書局,1967年),頁157。成書時間見王溥:《唐會要》(京都:株式會社中文出版社,1978年),頁651。
 - 2 王應麟《玉海》云:“《中興書目》十卷,秘閣所錄唐人墨蹟,乾道七年寫副本藏之,起第十一止二十卷,餘不存。”見氏著《玉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994—450。
 - 3 金光一:《〈群書治要〉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頁46。
 - 4 魏徵等撰:《群書治要序》,魏徵等編撰;《群書治要》校訂本編輯委員會校訂:《群書治要》校訂本(北京:中國書店,2014年),頁2。
 - 5 嚴靈峰將《群書治要》作爲探討定州竹簡《文子》的文獻資料。見《定州竹簡〈文子〉殘本試探》,《哲學與文化》24卷第2期(1997年2月),頁98—106。
 - 6 吳金華從古籍的目錄、版本、輯佚、校勘等方面,說明日本鎌倉時代古寫本《群書治要》的文獻價值,其中有關目錄學的角度與誤文的見解值得注意。見《略談日本古寫本〈群書治要〉的文獻學價值》,《文獻》2003年第3期,頁118—127。
 - 7 金光一的研究,在凸顯《群書治要》的文獻價值,考述所存佚書外,也探討《群書》(轉下頁)

用於分析《孫子》《三國志》《吳越春秋》等三典籍的文獻研究、⁸ 張蓓蓓《略論中古子籍的整理——從嚴可均的工作談起》、⁹ 潘銘基《日藏平安時代九条家本〈群書治要〉研究》、¹⁰《〈群書治要〉所載〈孟子〉研究》¹¹和《〈群書治要〉所錄〈漢書〉及其注解研究——兼論其所據〈漢書〉注本》¹²等，皆是文獻學論著的成績。然而，魏徵等人的編撰旨意，唐太宗閱覽後的宣示，皆指向群書的治要效用。太宗云：“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¹³ 面向經典的致用意圖，“不惑”的實踐，自然串起一貫的思想。誠如林信敬在講“此書之作”時所說：“先明道之所以立，而後知政之所行；先尋教之所以設，而後得學之所歸。”¹⁴ 細井德民也提到：“亦足以觀魏氏經國之器，規模宏大，取捨之意，大非後世諸儒所及也。今逐次補之，則失魏氏之意，故不為也。”¹⁵ 立道設教與魏氏之意的相映，說明日本漢學家已明確意識到存在於《群書治要》之中的精彩思想。聞一多以“主意”的《群書治

(接上頁) 治要》的編輯、體例與流傳，甚至觸及《群書治要》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地位，如同所言“研究是重新得出《群書治要》校勘整理本的基礎工作”，是文獻學角度下重要的研究成果。見氏著《〈群書治要〉研究》。

- 8 林溢欣：《從〈群書治要〉看唐初〈孫子〉版本系統——兼論〈孫子〉流傳、篇目次序等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1年第3期，頁62—68。《從日本藏卷子本〈群書治要〉看〈三國志〉校勘及其版本問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3期（2011年7月），頁193—216。《〈群書治要〉引〈吳越春秋〉探微——兼論今傳〈吳越春秋〉為皇甫遵本》，《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9年第1期，頁19—23。
- 9 張蓓蓓重視《群書治要》在中古子籍整理中的重要性。見《略論中古子籍的整理——從嚴可均的工作談起》，《漢學研究》第32卷第1期（2014年3月），頁39—72。
- 10 潘銘基考察目前所存最早的九条家本《群書治要》，並以所載《後漢書》、《孟子》與《慎子》為例說明在校勘典籍上的重要性，是釐清《群書治要》存世版本的重要研究。見《日藏平安時代九条家本〈群書治要〉研究》，《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7期（2018年7月），頁1—40。
- 11 潘銘基聚焦在“《群書治要》所載《孟子》及其校勘《孟子》用例”研究。見《〈群書治要〉所載〈孟子〉研究》，《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16輯（2018年8月），頁293—317。
- 12 潘銘基：《〈群書治要〉所錄〈漢書〉及其注解研究——兼論其所據〈漢書〉注本》，《成大中文學報》第68期（2020年3月），頁73—114。
- 13 劉肅：《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33。
- 14 林信敬：《校正〈群書治要〉序》，魏徵等編撰：《群書治要》校訂本，頁1。
- 15 細井德民：《刊〈群書治要〉考例》，魏徵等編撰：《群書治要》校訂本，頁1—2。

要》與“主事”的類書作區分，鮮明的標示出兩者的差異，就是十分精到的分判。¹⁶ 目前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陸續有些可觀的成果，舉如林朝成《〈群書治要〉與貞觀之治——從君臣互動談起》¹⁷與《〈群書治要〉與貞觀之治——以“牧民之道”為例》、¹⁸張瑞麟《〈群書治要〉選編〈墨子〉的意蘊：從初期墨學的解讀談起》¹⁹與《轉舊為新：〈群書治要〉的編纂與意義》、²⁰邱詩雯《治要與成一家言：論〈群書治要〉對〈史記〉的剪裁與再造》、²¹黃麗頻《論〈群書治要〉對〈老子〉的取徑與實踐——以貞觀之治為證》²²等，雖為數尚寡，已足見可拓展的空間與意義。本文即以這種回歸魏徵等人編撰思想的新視角，重新解讀所截選文獻的意蘊。

為了深入展示魏徵等人編撰內容已存在時代的思想色彩，本文鎖定《群書治要》取自《左傳》的一則史事——“華元食土”——作為分析的對象，以“文脈的分析”與“語境的掌握”作為釐清的方式。所謂文脈的分析，是透過經典文獻的還原，以及《群書治要》的整體構成，各依呈現的脈絡，釐清觀點的內涵。所

-
- 16 聞一多：《類書與詩》，《聞一多全集·唐詩編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6。匿名審查委員認為，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上》云：“《春秋》之義，昭乎筆削。”文獻之或筆或削，或取或捨，其中自有旨義可言，“以編代作”學理依據或在於此。此說可採，以補充本文所用方法之理據。又，匿名審查委員認為可與“選本”研究的方向作結合，將能獲得更為豐富的成果，確實如此，然而本文著重在確立《群書治要》富含貞觀思想內涵的論述，故將另文再行深入論述。
- 17 林朝成針對《群書治要》七大焦點議題之“為君難”、“為臣不易”、“君臣共生”與“直言受諫”，透過與《貞觀政要》關聯，作貞觀思想內涵的分析。見《〈群書治要〉與貞觀之治——從君臣互動談起》，《成大中文學報》第67期（2019年12月），頁101—142。
- 18 林朝成針對《群書治要》七大焦點議題之“牧民”、“法制”與“戢兵”，透過與《貞觀政要》關聯，作貞觀思想內涵的分析。見《〈群書治要〉與貞觀之治——以“牧民之道”為例》，《成大中文學報》第68期（2020年3月），頁115—154。
- 19 張瑞麟取《墨子》為例，分析《群書治要》的取捨與觀點的變化。見《〈群書治要〉選編〈墨子〉的意蘊：從初期墨學的解讀談起》，《成大中文學報》第68期（2020年3月），頁1—42。
- 20 張瑞麟透過整體的歸納與分析，認為《群書治要》存在七大焦點議題。見《轉舊為新：〈群書治要〉的編纂與意義》，《文與哲》第36期（2020年3月），頁1—54。
- 21 邱詩雯從《群書治要》的取捨，認為《史記》在三方式的處理下已呈現出再造的新貌。見《治要與成一家言：論〈群書治要〉對〈史記〉的剪裁與再造》，《成大中文學報》第68期（2020年3月），頁43—72。
- 22 黃麗頻取《老子》作為分析對象，論證《群書治要》所展現的接受變化。見《論〈群書治要〉對〈老子〉的取徑與實踐——以貞觀之治為證》，《東華漢學》第31期（2020年6月），頁1—31。

謂語境的掌握，在扣緊時代意義，透過歷史詮釋的變化與貞觀時期指涉的關懷議題，明晰《群書治要》在截錄經典時的敘事和義理。在這兩方面的關注中，呈現“華元食士”在歷史的詮釋效應及《群書治要》截錄“華元食士”的意涵。

《群書治要》有多個焦點議題，²³“華元食士”僅是記載鄭宋戰事的一則文本，涉及面向必然有所局限，但做為一個事件，微觀分析，釐清此則記載的剪裁手法，以及呈現出的時代觀點，則足以顯示出《群書治要》“以編代作”的編纂者詮釋性之一端。因此，本文期望藉此議題的探析，達到豐富化《群書治要》在思想層面上的研究。

二、“華元食士”的經傳原貌

《群書治要》原有五十卷，今存四十七卷，卷四至卷六截錄《春秋左氏傳》，卷四現闕，已佚失。依據留存的内容推論，卷四是截錄魯隱公到魯文公之間的文獻，所以卷五就從魯宣公元年（公元前 606）開始接續著編選。

本文討論的焦點，正是位於卷五第一則有關“華元食士”的内容，全文是：

二年，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禦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²⁴

呈現在《群書治要》裏的這段簡要文字，敘述完整，行文流暢，語意清晰，若不知魏徵等人對截錄的資料皆有精心的處理，很難自覺地去探查它原始的面貌，自然也就無從發現兩文本之間的差異，更遑論探析其間意蘊的變化。

回到《左傳》，還原《群書治要·左傳》有關“華元食士”在未刪削前的面

23 歸納、分析《群書治要》的内容，可見有七大焦點議題，包括“爲君難”、“爲臣不易”、“君臣共生”、“直言受諫”、“牧民”、“戢兵”與“法制”。見《轉舊爲新：〈群書治要〉的編纂與意義》，頁 1—54。

24 魏徵等編撰；《群書治要》校訂本編輯委員會校訂：《群書治要》校訂本，頁 85。本文討論資料引自《群書治要》者，爲避免繁複，以下將不再使用註脚而直接於文末標註頁數。

貌。華元、歸生帥師相戰,《春秋》經文云: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²⁵

《左傳》解經則使用五大段落、三大層面的書寫,大幅地豐富了《春秋》的內容。

其一,補述經文的事件。第一段的内容,可謂直接與經文相映,乃在《春秋》的框架下補充說明,使敘述的内容更加詳盡。《左傳》記載: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²⁶

透過《春秋》與《左傳》的比對,可見《左傳》不僅呈現攻守之勢使敘述變得生動,並且詳明戰事之起因與結局,叙明歷史的戰役,確實發揮了解經的效用。²⁷

其二,詳明敗績的成因。第二段“狂狡失禮”與第三段“羊斟敗國”,可視為《左傳》針對《春秋》所謂“敗績”的叙事因果說明。關於第二段“狂狡失禮”的内容,《左傳》全文是:

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

25 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頁362。

26 同上注。

27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文、事與義三方面,即是解讀《春秋》必須關注的面向,其中義的掌握是《公羊傳》與《穀梁傳》著重處,也是大分歧處。見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頁146。

戮也。”²⁸

整段內容是以狂狡爲主的書寫，採先描述後論述，理事相應的模式，呈現不見於《春秋》的《左傳》視角。在事蹟描述上，《左傳》特寫狂狡在迎戰鄭國時，對落井的鄭人伸出援手，卻反被擒獲。針對此事，《左傳》以“君子曰”點出狂狡的關鍵問題在於“失禮”，不知兵戎之事展現“果毅精神”方爲合禮。²⁹ 從內容來看，此段事蹟與觀點呈現完整，然而若考量第一段所言，領兵抵禦鄭國的是華元與樂呂，接續的人物敘述，理當以兩人爲主，但此段一反常態，轉而旁涉“狂狡”的書寫。爲何如此？從狂狡“倒戟”救“鄭人”，不能致力於殺敵，一方面藉以凸顯宋國方面“戎”不得“昭”，果毅精神的失落；另一方面藉由“失禮違命”的觀點，彰明身爲“大夫”³⁰的狂狡，竟不知“甲冑之戎”之爲“禮”。要言之，《左傳》明晰此事，意在顯示：宋師對敵若此，何能不敗？

關於第三段的“羊斟敗國”的內容，《左傳》全文是：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款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³¹

此段內容雖及華元，但主角應屬羊斟。與第二段的書寫模式相同，先敘述後論述，以理事相映的方式，呈現出不見於《春秋》的《左傳》視角。在事蹟描述上，《左傳》特寫羊斟懷恨華元殺羊不與，於宋鄭兩軍交戰之時，駕將領馬車直驅敵營而敗。針對此事，《左傳》特別以“君子謂”撻伐羊斟逞私敗國的大非。由此

²⁸ 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 362。

²⁹ 楊伯峻指出“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一句乃古語，意味“兵戎之事在于表明果毅精神，唯發揚果毅存念于心，行動于外，斯乃謂之禮。”見氏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 651—652。

³⁰ 狂狡的身分，見於杜預的注解。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 362。

³¹ 同上注，頁 363。

而言,《左傳》實是直接載明了宋師取敗的關鍵。然而,真實情境中的因果、成敗是複雜、多元的,單一現象的背後必有複數因素關聯著,也就是說羊斟現象並非是獨立的,《左傳》特別挑取居上的狂狡來與居下的羊斟相映比對,正可較為貼切而完整的揭示“宋師敗績”所存在的問題。

其三,華元形象的塑造。從閱讀接受的角度看《春秋》的這段記載,顯然華元及宋國是敘述的核心,也確實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不同於《春秋》扁平式地彰著事件的主角,《左傳》利用挑選兩事件的特寫,立體的打造出華元的良好形象。

第一件事是有關華元由鄭歸宋後與羊斟的互動,《左傳》記載: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³²

針對此事,《春秋》僅僅記載到主帥華元被擒為止,並未交代後續的發展,《左傳》補述這段空白,讓事件得以更完整的被了解。不過,在宋付贖金而華元逃歸的補述性說明之後,《左傳》顯然想運用與羊斟的對話,勾勒華元的形象。一般來說,敗戰被俘,何等恥辱? 害群之馬,如何輕放? 不過,此刻華元卻在見羊斟時先聲言“子之馬然也?”,寬厚之語道盡了華元的品格,也展現了《左傳》的用心。³³

第二件事是有關華元巡功卻遇城者嘲諷的應對,《左傳》記載:

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

³² 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 362。叔牂,杜注:“叔牂,羊斟也。”

³³ 竹添光鴻認為:“享小士而親近之御士不與,自是元失,歸而慰之,元亦自悔矣。”又說:“狂狡倒戟而獲,羊斟與人而敗,一則失禮違命,一則敗國殄民,兩兩關映,皆為華元陪襯,所以輕其戰敗之罪也。”作為解讀《左傳》敘述上的安排,此說極具參考價值。見氏著:《左傳會箋》(臺北:天工書局,1993年),頁 687—688。

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³⁴

此段從華元逃歸的群眾評價和群眾對話展開序幕，正可見《左傳》欲藉前後兩事之相映，讓華元的處境和氣度，成爲可被理解的對象。大體而言，此處書寫可從兩方面來看：其一，何以處下的城者竟敢當面譏諷身爲大夫、居於上位的華元？言外之意，正透露出華元親民得衆，不以威勢凌人的一面；其二，關於德性的展現，若說前段敘述關注與羊斟的互動，顯示華元的無“怨”；此處華元爲築城之主持者，巡行檢查工作，遭受築城者的諷刺與譴責，其間的對話，可視爲呈現華元的不“怒”。由此可知，經過《左傳》的視角所書寫的華元，戰敗主帥的罪責被淡化了，一個未見於《春秋》的立體形象被形塑起來了。

經由以上的梳理，可以清楚看到《春秋》與《左傳》之間，既有密切相印的部分，亦有各自不同的呈現。不過，《左傳》內容的豐富化與義蘊的明確化，確實讓此事件的可讀性大爲增加。魏徵等人應是基於此點，著手於《左傳》內容的截錄。只是，爲什麼《群書治要·左傳》此處呈現的是如此的樣貌呢？有沒有特殊的意義呢？如今有了原始的樣貌，兩相比對，其差異性自然透露了令人不可忽視的訊息。

將《群書治要·左傳》與《左傳》加以比對，可以發現魏徵等人截錄此處文獻，手法很是平凡，並不奇特。原因是《群書治要·左傳》內容的組成，簡潔地裁切自《左傳》的兩個部分，一是第一段“補述經文”的前半部文字，二是第三段“羊斟敗國”之敘事性文字。雖然前者略有刪文，將“春”、“受命于楚”與“樂呂”去除，後者則是做了完整的抄錄。

不過，在看似平凡中，卻透露出不平凡的氣息。有二點值得深入探討：其一，通順的行文。將兩段文字拼湊起來，展現的樣貌就像是原本如此，這不僅僅考量形式上字句的刪削取捨，更重要的是內容上語意脈絡的掌控。魏徵等人以第一段文字跳接第三段文字，了無痕跡，顯示出在意義的建構上非常精確。其二，材料的取捨。如上所述，《左傳》乃是以五段落、三層面來訴說此事件，原

34 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 363—364。

有《左傳》的書寫脈絡與呈現旨意,然而《群書治要·左傳》的選材,卻打破了這樣的架構。換言之,《群書治要·左傳》的內容,並不是《左傳》敘述文意的重現。第一段與第三段內容的挑選,顯然是有意地放大“華元食士”事件的意義。順此,再次檢視截錄的內容,前後段的性質顯有不同。前段屬戰事的記述,若立基於此,爲了達到完整的呈現,理當以第四段“宋贖華元”來銜接。由此可知,《群書治要·左傳》的核心事件當在後段,前段轉成爲背景鋪陳的作用。至於成爲焦點的後段,爲何取材自第三段呢?以關聯性來說,第二段同樣涉及戰事及其成敗,第四段有著共同描寫的人物,第五段同樣描寫華元的形象,並且兼具故事性與生動性。因此,魏徵等人截選第三段的內容,應有其特殊的關懷與用心。以下,由兩方面的梳理,嘗試說明之。

三、《左傳》的接受：“大棘之戰”的詮釋變化

在解析《群書治要·左傳》此則內容的意蘊前,先行掌握它被解讀與接受的狀態,將有利於清楚描述其中的變化與意義。如上所述,回溯至《春秋》,《群書治要·左傳》此則敘述實是關聯《左傳》五段內容,歷來儒者有諸多層面的關注,爲了扣緊《群書治要》的關懷,無關宏旨的字詞訓釋暫不細究,將討論的焦點放在人物品評的考察上。以下,依序呈現羊斟、華元與狂狡的相關評價論斷。

(一) 羊斟

在《春秋》裏,宋鄭大棘之戰的書寫,只提及華元與歸生兩主帥,因而解讀“宋師敗績”的空間並不大,指向華元承擔敗責是自然的想法。然而,有了《左傳》的敘述,究責對象變多了,“宋師敗績”一語就從單純走向了複雜,可詮釋的空間也就變大了。

透過《左傳》的敘述,讓人清楚了解到造成“宋師敗績”的關鍵,就在羊斟駕車入鄭。《左傳》也用“君子謂”的形式,以“非人”、“敗國殄民”、“殘民以逞”等語嚴厲地批判羊斟的惡行。在事與理的相映下,《左傳》的說法似乎成了正解,

但事實上經過歷代儒者的接受，解讀詮解產生了些許的調整與變化。³⁵ 整體而言，可劃分為三種解讀取向：1. 據德知義：無良敗國；2. 見情察微：不知與有怒；3. 依理推論：存疑不從。

1. 據德知義：無良敗國

分析《左傳》的判斷，顯然有兩個既定的價值判斷，一是來自於個人所產生的情緒，是屬“私”的領域，不該外現，也沒有被端上檯面討論的價值；二是在國之“公”的架構下，個體之“私”本不足逞怨洩慾，更不該以私害公。由此，在漠視個體的問題下，羊斟成了箭靶，華元就從主帥扛責的顯性角色，轉變為受牽連的隱性角色。秉持這種看法的，如杜預（元凱，222—284）注“《詩》所謂‘人之無良’者”云：

《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³⁶

考究《詩經》，當是指《角弓》：“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³⁷ 嚴格來說，明晰了“怨”以呼應羊斟“私憾”的“恨”，似乎只是單純的解經，但是若加上注“對曰：‘非馬也，其人也。’”云：

叔詳知前言已顯，故不敢讓罪。³⁸

顯然杜預是贊同《左傳》是非判斷的視角，因此在體貼其情境下，形成羊斟“不敢讓罪”的解讀。也就是說，在“私”—“怨”—“罪”的關聯下，羊斟理當受到嚴厲的譴責。有關於此，縱使鄭衆（仲師，？—83）、賈逵（景伯，30—101）與服虔（子慎，？—192？）等在華元和羊斟話語歸屬的判讀上存在分歧，但不見立論角

35 三《傳》解《經》，自是以見於《經》的華元為主軸，三《傳》間亦互有影響交涉。而狂狡與羊斟雖獨見於《左傳》，但受華元的解讀變化，亦將隨之而變。

36 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 363。

37 毛公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頁 503。

38 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 363。

度的轉變,最終孔穎達(仲達,574—648)在疏解時也是順從杜預的說法,再現此羊斟認罪的情境。³⁹ 宋人魏了翁(華父,1178—1237)也批判羊斟:

戎士尚節義,故訓之使知義。如羊斟之徒,是不知義也。⁴⁰

“義”的“知”與“不知”,顯示了宋儒在節義價值原則判斷的論點和政治倫理理分的關懷。同時也展現出對羊斟由外在行為深入到內在道德的批判變化。

《左傳》這種根據道德價值作判斷的角度,也影響到經典之外的解讀,《說苑》是記載此事且被引述的典籍,其言: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⁴¹

與《左傳》記載近似,甚至與《群書治要》裁去“君子謂”的手法相同,不過劉向(子政,前77—前6)將它置入《貴德》之中,足見仍是《左傳》據德批判的觀看角度。

2. 見情察微: 不知與有怨

以《左傳》視角爲主的解讀裏,呂祖謙(伯恭,1137—1181)雖然也說:“大棘之敗,羊斟之罪也。”⁴² 罪歸羊斟,看法上似無差異,但從整體的論述來看,就呈現出情理兼顧、複合視角的獨特觀點,他說:

華元殺羊食士而其御羊斟不與,人皆以爲待羊斟之薄,吾獨以爲待羊斟

39 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363。

40 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見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冊153,頁518。

41 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107—108。祝穆輯入《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十六的《飲食部》,見祝穆輯,富大用輯:《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頁1294。

42 呂祖謙:《左氏傳續說》,見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2,頁213。

之厚焉。元之意豈不以斟為吾御幾年矣？……今日饗士，吾肘腋同體之人，豈計一杯羹以為輕重？姑及疏者、遠者可也。羊雖不及，然親厚之意，固已踰百牢而豐五鼎矣。斟不知享其意，而徒欲享其食，忿戾勃興，驅車趨敵，投華元於死地，覆喪師徒而不顧。元待之以君子之心，斟報之以小人之行，非特負元，乃負國也。⁴³

呂祖謙掌握的立論根據，就是“人情”，如同他所說：“天下之情，固有厚之而薄，薄之而厚者，不可不察也。”人情相與之際，有超越形骸之外的精神價值和同體之情。⁴⁴ 由此重新解讀華元與羊斟互動，在兼顧人與事、情與理的多元思慮下，使得觀點呈現了深刻性與合理性。以羊斟來說，呂祖謙認為他之所以有負元與負國的“小人之行”，根本原因即在於“不知”，因“不知”的狹隘格局，致使無法納受他人之真“意”，只能計較於現實利害的“食”，可謂善體小人心思。至於，華元方面，除了明晰人與人之間在長年互動下應有的情感外，並且揭示在“不與”中寓含“同體”的“親厚”之意，可謂善解華元的“君子之心”。如此的解讀，從結論來說，依舊是《左傳》回護華元批判羊斟的走向，但以“對待”視角，依情理扭轉了“不與”的理解，則展現更加圓融的思慮。也就是說，在呂祖謙的解讀裏，正面處理了“人皆以為待羊斟之薄”的議題。

其實，“人皆以為待羊斟之薄”是一個關鍵問題，也透露了關鍵訊息。再看下一段論述，呂祖謙說：

議者或謂元御下寡恩，以起羊斟之怒。吾觀元之為人，樂易慈祥之氣，溫然可挹，其免於囚虜而歸，再與斟遇，猶慰解勉勞，若恐傷其意者；下至隸役之嘲譏，亦逡巡退避而不校，則元豈寡恩者哉？元尚能恕斟於既為變之後，乃不能撫斟於未交兵之前，無是理也。此吾所以論元之待斟，蓋厚而非薄也。⁴⁵

43 呂祖謙：《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44。

44 同上注，頁243—244。

45 同上注，頁244。

整段論述的目的,無非是回擊華元“御下寡恩”的說法,呂祖謙的觀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轉“薄”為“厚”。不過,根據呂祖謙的闡釋,正好可以掌握到兩個重要的訊息:其一,在譴責羊斟之外,已關注到“羊斟之怒”,因而審視華元的言行;其二,華元寡恩與待薄的認定,成爲了一種普遍被接受或討論的說法,也是呂祖謙不得不回應的原因,這顯示出此觀點的存在與發展已有一段不短的時間。由此而言,呂祖謙的觀點應是整合前人的關注,以獨到的識見,提出綜合性的解讀。

據此,由呂祖謙往前追索,確實可見一些詮釋變化的跡象。如《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所言:

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⁴⁶

《呂氏春秋》是以處事的角度來切入,所以基於主事者必須“悉熟偏備”、“知彼知己”,認定華元在有疏失的情況下被虜是不可避免的結果。《淮南子·繆稱訓》則將“羊羹不斟而宋國危”與“魯酒薄而邯鄲圍”排比並列,意在彰顯聖人具有見微知著、防患未然的識見。⁴⁷ 相近的說法,也見於北齊的《劉子》,劉晝說:

智者,識輕小之爲害,故慎微細之危患,每畏輕微,慄慄焉若朽索之馭六馬也。……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偏而宋師敗,郈孫以鬪鷄亡身,齊侯以笑嬪破國。皆以輕蔑細怨,忘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爲天下笑,不慎故也。⁴⁸

46 許維遙:《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420—421。

47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742—743。

48 劉晝著,傅亞庶校釋:《劉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336—337。

不僅魯酒與羊羹相連為喻的形式和《淮南鴻烈解》相同，並且置於《慎隙第三十三》之中，用以闡明“謹小慎微”的觀點，旨意亦是相近。至於宋人潘自牧在編纂《記纂淵海》時，就直接將這些資料放進《論議部》“因小失大”中，可謂保存了這種解讀的原貌。⁴⁹ 不過，雖然“謹小慎微”觀的提出，讓解讀產生了些微的變化，但求善之意終未改變立足華元的觀看角度，羊斟發洩之“怨”與“怒”仍被忽視。試觀柳宗元《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能稱，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⁵⁰

此文的主題為“饗軍”，擷取華元的“御者不及”與霍去病的“士有飢色”，自是為了解照出主人翁善待下屬的一面。杜佑《通典》則用“賞宴不均致敗”為目來安置此段故事。⁵¹ 李延壽《南史》也提到說：

古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也。……昔華元敗則以羊羹而取禍，觀夫庾悅亦鵝炙以速尤。乾餱以愆，斯相類矣。⁵²

將“利”帶入解讀華元與羊斟、庾悅與劉毅的衝突，亦是一番別解。不過，最值得令人關注的是，這些唐人的解讀皆具有一種走入“互動情境”的特點，正與呂祖謙“對待”的視角相契合。換言之，唐人採用了“互動情境”來解讀文本的脈絡，讓文本的敘述產生了新意。

3. 依理推論：存疑不取

宋代大行的疑經改經風氣起於唐代異儒啖助（叔佐，724—770）、趙匡（伯循，唐大曆時），兩人正是針對《春秋》提出不信三傳的突破性說法，韓愈（退之，

49 潘自牧編纂：《記纂淵海》（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322。

50 柳宗元：《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柳河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444。

51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3884。

52 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925—926。

768—824)《寄盧仝》有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⁵³正可移作寫照。師友啖助、趙匡的陸質(伯沖，?—806)纂述了兩人對於此段解經的看法，⁵⁴其意為：

左氏說：“宋敗之由，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啖子曰：“且軍士猶饗之，況其御乎！御既寡且親近，必無不與，故不可從也。”又言：“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于鄭。”“既受贖，許歸華元，何用逃乎！”又言：“華元巡城，城者謳，華元之御答以‘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棄甲者，譏其喪師徒也，豈專惜甲冑乎！華元賢臣，豈肯以多犀兕文其過，輕答城者乎！皆近誣也，故不取，又非解經之義也。”

穀梁曰：“盡其衆以殺其將，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趙子曰：“按軍敗身獲而云不病，此說非也。但緣師先敗績，身乃見獲，依次第書之，有何褒貶乎！若欲褒貶之，乃足見其不身先士卒爾，何得云善也！晉侯夷吾之見獲，為馬陷澗中，師實不敗，各依事實而言，無煩曲說。”⁵⁵

兩段內容，分別是啖助辨析《左氏傳》解經三疑慮，與趙匡辨析《穀梁傳》“雖獲不病”說的言論。從啖助提出的三看法，包括：羊斟的身分有“既寡且親”的屬性，不可能產生“不與”的狀況；宋鄭兩國既然達成贖人協議，華元沒有必要逃歸；身為賢臣的華元，不可能有文過輕答的行為。由此，可知都是依據事理應當發展的邏輯作推論，具有很强的理性色彩。至於趙匡方面，認為《春秋》的書寫只是依“事實”、“次第”的客觀呈現，若定要追尋其中不可知的“褒貶”，華元“不身先士卒”才是評價的關鍵，同樣是依事理來推論，提出與《穀梁傳》不同的見解。啖、趙二人實事求是的依理解讀，雖然容易因為未顧及時空變異的問題

53 韓愈：《寄盧仝》，見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臺北：學海出版社，1985年），頁782。

54 陸質本名陸淳，因避憲宗諱而改。與啖助、趙匡的關係，說法不一，今從柳宗元師友說。根據陸質《春秋集傳辯疑凡例》所示《春秋集傳辯疑》乃“纂啖、趙之說”，可知觀點乃分別歸屬兩人。陸淳：《春秋集傳辯疑凡例》，陸淳編纂：《春秋集傳辯疑》（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

55 陸淳編纂：《春秋集傳辯疑》，頁86。

而流於表面化的詮解，但確實能打破框架卸除一些穿鑿附會的說法，尤其如“寡且親”之類，以讀者之情理介入文本的解讀方式，確實能賦予古典以新意，由呂祖謙的近似觀點即可見得。

(二) 華元

與羊斟的解讀相應，關於華元的評價，雖然《左傳》在厚葬宋文公一事上以“君子謂”直白提出批判說：“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⁵⁶但更多相關事蹟的書寫，如夜入楚師、蕩澤之亂、弭兵之盟等，則立下了賢者華元的解讀方向。因此，杜預在注解此段敘事時，即緊扣此意以發明之，如注“立于門外，告而入。”句，即曰：“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以示華元有禮；注解對羊斟語，即曰：“華元見而慰之。”以顯華元寬厚；注解城者謳一事，即曰：“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此直接彰著華元的胸襟。⁵⁷

與《左傳》重要性相當的《穀梁傳》，也是傾向從正面來看待華元。《穀梁傳》云：

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⁵⁸

從“獲”字衍生爲大議論，正體現《春秋》一字褒貶的特點。根據《穀梁傳》延展開的闡釋，“不與”與“不病”判斷，已充分顯示出敗戰無罪的回護之意。爲之注解的范寧（武子，約339—401），也順意闡釋說：“華元得衆甚賢，故不與鄭獲之。”又說：“先言敗績而後言獲，知華元得衆心，軍敗而後見獲。”⁵⁹已直接揭示出推崇華元的觀點。然而，如此解讀模式，填補訊息太廣，發揮空間太寬，歧見難免存在，如

56 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427。

57 同上注，頁363—364。

58 范寧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頁116。

59 同上注。

何休(邵公,129—182)就提出質疑說:“書‘獲’,皆生獲也。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只是范寧引用了鄭玄(康成,127—200)的說法來化解,鄭玄說:

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衆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績”,非變文如何?⁶⁰

鄭玄是集兩漢經學大成的重要儒者,其見解自是令人重視。透過引文,不僅可見鄭玄正面回應何休“變文”的問題,並且由“適明其美”一語更是直接翻轉“師敗身獲”的貶義,讓華元擁有“賢行”之說確立不移。

《公羊傳》對宋鄭大棘之戰並沒有提出看法,但何休卻有作注:

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⁶¹

結合上文提到的質疑,可知身為公羊學的重要學者,何休對於華元在此事件的看法是負面的。但是,就如同劉敞(原父,1019—1068)對於何休注解宣公二年與成公十五年所提出的質疑:“此一華元之身,或冒宋以惡賤之,或冒宋以美大之,是何淆亂哉。”⁶²又云:“若實賤恥乎,若實美大乎,何二三也?”⁶³矛盾的現象,其實也正說明了何休隨事抑揚、有褒有貶、美惡並陳的解讀方式。換言之,即使何休讀出了一部分惡賤華元的味道,但“賢大夫”的形象,還是經傳解讀華元的基底。

三《傳》之後,宋代學者對華元的解讀呈現出巨大的分歧,如葉夢得(少蘊,1077—1148)說:

60 范寧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頁116。

61 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頁189。

62 劉敞:《春秋權衡》,見永瑢、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7,頁301。

63 同上注,頁305。

華元獲再見宋，華元盡力於戰，不以獲恥華元，善之也。⁶⁴

見解與何休異，認為《春秋》之意不在以“敗”貶斥華元，而是肯定華元能“盡力於戰”。黃震（東發，1213—1280）不僅取用葉氏的說法，也引述了趙鵬飛的解讀：

歸生雖勝，卒為弒逆之階。華元雖敗，不失為賢大夫。信乎！聖門不道戰功也。⁶⁵

趙氏解讀時帶入孟子不道戰功，不道齊桓霸道之微旨，在孫復（明復，992—1057）《春秋尊王發微》中已能看到，只是孫氏重在明晰“惡鄭公子歸生”而未及於華元，⁶⁶趙氏則直言“聖門不道戰功”，華元雖敗並無損於“賢大夫”的形象。與此判然有別，如李石（知幾，1108—1181）認為：

嗚呼！百乘之車、百駟之馬與一食之羊孰多？有以見宋華元無統眾之才，杜預釋之，以華元寬而容眾，非也。⁶⁷

直接反駁杜預指華元“寬而容眾”的說法，取而代之的是缺乏“統眾之才”的質疑與批評。葉適（正則，1150—1223）也說：

華元敗師見獲，逃歸，其材與節皆喪矣。雖役人歌之，而君子無貶辭，將以所長蓋其所短耶？然則人材之所至，要亦未易論也。⁶⁸

64 葉夢得：《葉氏春秋傳》，見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9，頁 146。

65 黃震：《黃氏日抄》（京都：株式會社中文出版社，1979 年），頁 120。

66 孫復：《春秋尊王發微》，見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7，頁 70—71。

67 李石：《方舟集》，見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49，頁 793。

68 葉適：《習學記言》，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 9 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18 年），冊 9，頁 127。

雖然葉適最後保留斟酌空間,但是就整件事情來說,葉適已認定華元是“材與節皆喪”,明顯展現出轉褒為貶的批判觀點。李明復(伯勇,1174—1234)在《春秋集義》中也引述了程氏學認為罪在見獲者的看法,以及謝湜(持正,元豐進士)的觀點,⁶⁹謝湜說:

然則大棘之戰,由宋華元好戰致之也,故以華元主戰而罪之,師曲在宋,可知也。華元逞一朝之怨,進不由義,出不量敵,乃至師衆大敗而身獲于人。書“獲宋華元”著,大夫好戰之禍也。⁷⁰

使用“好戰”、“逞一朝之怨”、“進不由義”、“出不量敵”之語指責華元,可謂已是毫不保留的批判。由“大夫好戰”一語的針對性,除寓含春秋時代禮壞樂崩之意外,更是直接將“禍”指向無可卸責的華元,《左傳》“羊斟敗國”成了無關緊要的小事。此外,孫覺(復明,1028—1090)也反駁《穀梁傳》不病華元的說法,認為華元在宋主政,當使寇讎不來,卻淪落至師敗見獲,《春秋》所以書寫,即是要表達“罪之”之意。⁷¹ 以上諸說,足見批判華元力道之強。

在褒貶不一、見解分歧的宋代,呂祖謙看待華元的觀點最為重要,值得深入討論。呂祖謙說:

宋鄭大棘之戰,華元師敗身囚,其辱國亦甚矣,終不失為春秋名臣者,蓋元之為人雖有寬縱處,亦有含洪之度。觀羊斟與入鄭師而敗……元乃曰:“子之馬然也。”又如,城者之所嘲誚……全不與之校,聞其言即去

69 劉德明指出程頤學派的理學視角是從天理的盡善盡美來責備賢者,這與《公羊傳》、《穀梁傳》“為賢者諱”的態度,有非常大的不同。此間即點出觀看角度所產生的詮釋變化。見《程頤學派對齊桓公的評價——以程頤、謝湜與胡安國為核心》,《成大中文學報》第56期(2017年3月),頁1—36。

70 李明復:《春秋集義》,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5,頁559。主戰之說,亦見於劉敞:《劉氏春秋傳》,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7,頁427;胡安國:《胡氏春秋傳》,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1,頁137。

71 孫覺:《春秋經解》(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84。

之。此二事，足見元之度量，深得為上之體。大抵為上有包含容納之度，雖有小疵亦蓋覆得過，古人居上克寬之道，元雖未盡如古人之寬，亦足以得其髣髴，所以能維持宋國也。⁷²

“辱國亦甚”一語，說明了呂祖謙也不反對華元敗戰所造成的傷害，但“不失為春秋名臣”的說法，則顯示了呂祖謙承接了正面評述華元的觀點。如何調解之間的衝突？要言之，即關注內在的核心精神。呂祖謙認為華元之所以為名臣，從不殺羊斟與不計較城者嘲諷兩事，足以顯示出華元具有“含洪之度”，而寬宏的度量正契合於古人居上的“克寬之道”，這也是華元得以“維持宋國”的關鍵原因。換言之，呂祖謙直接將敗戰的“小疵”擱置，透過人情互動的角度，重新解讀兩事件，以內在價值的體貼與揭示，讓華元的賢良形象再次挺立。當然，過份的掩過、溢美，終不如真實以對來的有效，呂祖謙當深知此道，故云：

然元亦不能無罪焉。日與斟周旋，不知其肺腑，猶以君子待之，一罪也；箠食豆羹，見於色之人，乃與共載，託於死生，二罪也；情意未孚，而遽忘彼我，以示無間，三罪也。明不足以燭姦，誠不足以動物，何適而不逢禍哉？惜乎！華元有君子之資而未嘗學也。⁷³

仍是依人際互動的情理來思考，認為華元有識人不明、妄託生死與交淺言深三罪，不過仔細斟酌所謂待之以君子、共死生、忘彼我的說法，反而凸顯出華元樸實真誠的美質，此刻罪已非罪，正如所謂“有君子之資而未嘗學”，是喻褒於貶的手法。日本漢學家竹添光鴻（漸卿，1842—1917）在《左傳會箋》中提到：

華元逃歸不怨叔牂，巡功不怒城者，一則寬釋在前，一則含容在後，兩兩關映，皆為華元寫照，所以著其賢也。⁷⁴

72 呂祖謙：《左氏傳說》（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49。

73 呂祖謙：《東萊先生左氏博議》，頁244。

74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頁689。

以文章結構為切入角度，認為兩事書寫的用意，即在“不怨”與“不怒”中照見華元“寬釋”與“含容”的品格，並在兩相對映下彰著華元賢良的形象。見解與呂祖謙近似，可知此解讀方式趨於圓融較易為人所接受。

與羊斟的解讀相應，華元在宋代呈現出的看法分歧亦可往前追溯。除了前文所述，以對待關係、互動情境聚焦關注華元與羊斟外，與詩文寫作相關且具有廣泛流通和影響性的類書編纂，如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等，將此事蹟重新分部與歸類，作法顯然亦延續至宋、明類書，如《太平御覽》、《古今事文類聚》、《山堂肆考》等，對於擺脫《左傳》的解讀框架，應亦產生一些效應。如周曇《華元》：“未知軍法忌偏頗，徒解于思腹漫皤。昔日羊斟曾不預，今朝為政事如何。”⁷⁵質疑華元偏頗的聲音，甚至為政的能力，放在“為賢者諱”的詮釋脈絡裏，顯然是非常特出的。

(三) 狂狡

觀察“華元食士”事件中提及的狂狡，可以看到入唐後詮釋的變化。以孔穎達的說法為例，他說：

軍法以殺敵為上，將軍臨戰，必三令五申之。狂狡失即戎之禮，違元帥之命，曲法以拯鄭人，宜其為禽也。……人言在軍對敵必須殺也……是軍法務在多殺，殺敵乃為禮也。《公羊》善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此”。武王之戰既知不然，文王之戰豈當若是？審如《公羊》之言，文王未曉戰法，其不能身定天下，豈為此乎！⁷⁶

此間透露三訊息：其一，是孔穎達與《左傳》一致對狂狡持批判的立場；其二，是孔穎達與《左傳》的觀點有別；其三，是《公羊傳》與《左傳》的看法相左。先就批判狂狡來說，《左傳》以“君子曰”提出批判的觀點，孔穎達同樣認為狂狡“宜其為禽”，立場一致。然而，考究其想法，兩者觀點卻存有差異。就《左傳》來

75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8342。

76 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362—363。

說，關注的焦點顯然在“禮”，認為狂狡非無禮，而是不知“甲冑之戒”的禮，以非禮為禮，所以在“失禮違命”的批判下闡明禮的內容。至於，孔穎達的說法，顯然體現了與春秋時期對法的不同態度與認知，雖亦提及“禮”，但“法”才是論斷核心，所以務在闡明“軍法”。兩相比較，顯然“禮”的認知有所不同，在孔穎達的觀點中，所謂“軍法務在多殺，殺敵乃為禮”，此“禮”當即為“理”，指合理合宜的行為，所以有明顯的理性精神和軍法的連結。換言之，到了孔穎達時，透過重新的體貼，觀點已有了變化。順此以觀《通典》，杜佑將之解讀為“輕易致敗”，⁷⁷雖未能善體狂狡之心境，卻也呈現出此刻開放性詮釋的趨勢。

至於《公羊傳》與《左傳》看法相左方面。孔穎達結合宋襄公泓水之戰來討論，關聯似嫌疏遠，但就此議題而言實具承先啟後的作用。何休指出：

狂狡近於古道。⁷⁸

“近於古道”一語正揭示出狂狡所以有如此行徑的內在精神，也是與宋襄公連繫的關鍵。換言之，即使看法相左，但是關注的層面卻相近。以鄭玄的見解為例，鄭氏指出：

狂狡臨敵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譏之，義合於讖。⁷⁹

“近於古道”與“居於小仁”的對立，分歧點正是價值精神上理解“禮”所形成的差異。此後，呂祖謙即延續此議題再立新說，呂氏指出：

宋襄公持“不重傷、不擒二毛”之說，以敗於泓，舉國皆咎之，其說不足以移人可知矣。襄糧坐甲，固敵是求，非我殺彼，則彼殺我，當是之時，反欲縱敵以為仁，其迂暗至此，尚足與之辨乎？……三四世之後，乃有狂狡者

77 杜佑：《通典》，頁4057。

78 鄭玄：《箴膏肓》，見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5，頁868。

79 同上注。

生長於宋，聞襄公之風而悅之。……是知邪說不足以惑當時者，未必不能惑後世。……異端邪說之在天下，固有鄙陋乖誤不足以欺愚眩衆者，然安知世無偏好獨嚮若狂狷之於宋襄乎？吾是以益知異端邪說果不可存於世也。⁸⁰

不同於對華元的體貼與價值重構，呂祖謙對宋襄公與狂狷展現了嚴厲的批判。顯然，“縱敵以爲仁”置於殺伐征戰中，呂祖謙認爲是違理乖誤的，所以不僅指稱宋襄公“迂暗”，並且視之爲“異端邪說”。由狂狷也展現了“縱敵以爲仁”的行徑，正坐實了“異端邪說”之惑與害。對於宋儒來說，在佛教影響與儒學重“知”的因素下，“異端邪說”成爲特殊的議題與克服的問題。⁸¹ 換言之，“異端邪說”的指控，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因此，就不難理解呂祖謙欲藉以彰明“異端邪說果不可存於世”的理念。

四、貞觀視角：《群書治要·左傳》的應用詮釋

有了詮釋史和接受史的掌握，就能描繪特定階段文本詮釋的變化。爲了具體呈現魏徵等人截錄《群書治要·左傳》所蘊含的義理和觀念，分兩點說明其意蘊及當調之意：一者，解析魏徵等人在“華元食士”所截錄經傳文本的去取原則；二者，藉《群書治要》選錄文本的內證與《貞觀政要》所見語境脈絡的外證，在內外相映下明晰此截錄文本的應用詮釋。

(一) 定焦“華元食士”

怎麼解釋從《左傳》到《群書治要·左傳》的變化？最顯著的差異有三：

80 呂祖謙：《東萊先生左氏博議》，頁 242—243。

81 二程說：“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闢，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面對異端的刺激與挑戰，程頤說：“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宋儒著力於“知”處作儒釋之辨。見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 38、320。

首先，夷夏觀。在《左傳》裏，原有“受命于楚”四字，杜預注說：“受楚命也。”⁸²用以說明鄭國發兵攻打宋國，主要原因來自於楚國的命令。楚國，在春秋時期是被視為夷狄，如《公羊傳》：“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⁸³已含明顯的夷夏之別的意識形態，這個觀點在孫復“尊王攘夷”觀下被著意發揮，所謂“戕艾中國”即是，⁸⁴黃震也說：“附夷狄而戕中國”族群分判極為嚴明。⁸⁵然而，在貞觀時期，縱使初期尚有對外方針上“耀兵振武”或“偃革興文”的路線爭辯，⁸⁶但以貞觀四年四夷君長上唐太宗“天可汗”尊號，⁸⁷以及貞觀二十一年時太宗自述能成就過人功業的五大原則之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⁸⁸由此可見，帶有區別夷夏的觀點，在貞觀時期並不具太大意義，因此“受命于楚”四字被刪去而不見於《群書治要·左傳》，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刪去狂狡。如前所述，在初期經傳的視閥裏，契合禮壞樂崩的時代課題，“禮”是關注的焦點，但是到了唐代，透過孔穎達反諷《公羊傳》推崇宋襄公泓水之戰的說法，顯然已跳脫鄭玄“小仁”與何休“古道”的爭辯，講究的是征伐取勝的合理作為。狂狡行徑明顯有違軍法，並無資鑑作用，捨去不取，當屬合理。

三者，焦點轉移。所謂焦點的轉移，乃指由《左傳》“羊斟敗國”的歷史敘述焦點轉移至“華元食士”的情境脈絡上。由於受到華元賢大夫形象的影響，各家在詮解敗戰時，除何休有異議外，對華元多有回護，《左傳》更明載事蹟，直接用“無良”批判羊斟。因此，以私憾殄民、敗國殘民為意的“羊斟敗國”，就成為最矚目的詮釋框架。然而，隨著詮釋框架的鬆動，不再執持單一的角度來看待此事，開始重新思考“羊斟之怒”，引發怒氣的華元就進入了被檢視的視閥，呂

82 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 362。

83 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頁 143。

84 孫復：《春秋尊王發微》，見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7，頁 71。

85 黃震：《黃氏日抄》，頁 120。

86 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290。

87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頁 6073。

88 同上注，頁 6247。

祖謙的解讀可謂是精彩的展現。這種擺脫賢者華元的既定束縛,聚焦華元與羊斟的思考,如前所述,在唐代可見到一些可貴的觀點,詮釋視角已轉移而定焦在“華元食士”上。以《群書治要·左傳》而言,刪去“君子謂”一段,羊斟不再是整篇論述的焦點,並且可以弱化對羊斟行徑的批判,達到重新思考華元與羊斟互動的作用。

(二) 人際經營:“惠下廣施”與“屈己得人”

透過以上的分析,雖然可以看見詮釋的變化,但究竟《群書治要·左傳》隱含的思想為何?從“華元食士”的採摭,呈現關注情感、重視互動的人際經營取向。當貞觀思想展現有意識的貶低自我,轉向看見他者的價值存在,強調彼此的互動情境下,造成羊斟生怨的華元,就是一個不得人心、有缺失的領導者。⁸⁹因此,將截錄後的“華元食士”,置於貞觀思想之中,新的解讀與關注就浮現了出來。以下即從內外兩面說明之。

1. 外證:《貞觀政要》的“惠下廣施”觀

太宗初登大位時,治國方針並未確立,魏徵“仁義為治”與封德彝“任法御人”的爭辯,⁹⁰就是個關鍵性的事件。魏徵主張:

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⁹¹

依魏徵的角度而言,人民是一張白紙,會有如何的展現,端看執政者的作為,所

89 林朝成:《〈群書治要〉與貞觀之治——從君臣互動談起》,頁101—142。

90 此處用語取用唐太宗說法:“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一時,敗亡亦促。既見前王成事,足是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望革近代之澆薄也。”時間雖記載於貞觀元年,但從論述內容可知是接納魏徵的建言,貞觀二年的說法可資為證,太宗說:“朕謂亂離之後,風俗難移。比觀百姓漸知廉恥,官人奉法,盜賊日稀,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是以為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從“風俗難移”到“人無常俗”,足見觀點的變化。見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頁249、251。

91 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頁36。

以古代的理想政治——“王道”、“帝道”，是可再現的。封德彝則反駁說：

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恐敗亂國家。⁹²

封德彝並非否定魏徵提出的政治理想，而是針對實踐層面提出質疑，認為秦任法、漢用霸，就是因為人民已非三代的古樸，在日趨澆訛下，只能改變治理方式，若還是堅持行使王道，將使國家敗亂。如同宋人樓鑰（大防，1137—1213）所說：“唐太宗求治之初，魏徵仁義之說，自今觀之，是為空言；封德彝法律之說，自今觀之，是為實用。然太宗斷然行魏徵之言，而成貞觀之治。”⁹³在現實情境中，封德彝不為無理，魏徵不必為是，終因唐太宗的踐行，造就了世人傳唱的“貞觀之治”。

“仁義為治”作為治國理政的方針，其內涵必然涉及多元面向，其中有個重要的面向與本文的議題相關。試觀貞觀十一年時魏徵提出的說法：

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⁹⁴

文字論述緊扣著道德仁義，不僅具體圖繪最終理想，並且申明實踐的方式。此間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魏徵對“仁”所提出的界定——“非仁無以廣施”與“惠下以仁”。以“惠下廣施”作為“仁”的解釋，很清楚的就是著重於與他者的關係，相對於“仁義內在”，乃傾向實踐層面的思考。如是觀點，在著名的《諫太宗十思疏》也可見到，魏徵說：

92 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頁 36。

93 樓鑰：《論實用空言》，《攻媿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301。

94 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頁 293。

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在君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⁹⁵

相對於智者長於謀、勇者大於力、信者盡於忠的展現，“仁”者主要即在於能施惠他人。然而，仁者的“播惠”，並非僅指單純的物質上利益的給予，得以與他者建構起情感的共感相通，才是關鍵所在。試觀一則太宗與魏徵的對話，《貞觀政要》記載：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特進魏徵曰：“朕克己為政，仰止前烈。至於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為稱首，朕皆庶幾自勉。人苦不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等優劣？”徵對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與仁，願陛下自彊不息，必可致也。”⁹⁶

太宗明顯地從施政層面來思考問題，關懷的就是實踐的成效，德之所以稱“積”，仁之所以稱“累”，功之所以稱“豐”，利之所以稱“厚”，就是量化的具體檢視。然而，魏徵究竟非膚淺之輩，不會簡單的將價值的精神直接物化，所以當可量化的“功”，用“內平禍亂，外除戎狄”來衡定之後，接續分析“利”時，所謂“安諸黎元，各有生業”，為何不屬“德”又不屬“仁”？魏徵雖未有說解，但不取物質層面的給予與獲益為仁之施、德之行，應是可以理解的。由此而言，如何才能是“德”與“仁”？貞觀十一年時馬周（賓王，601—648）上疏中提到：

自夏、殷、周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

⁹⁵ 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頁18。

⁹⁶ 同上注，頁153。

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基。……且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⁹⁷

“積德”的說法與前文相映，所以藉此當可掌握何謂仁德之積累的問題。全文論述的重心，在於揭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是三代與漢朝為何能夠傳祚相繼而魏晉以來享國短促的關鍵。仔細分析“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一語，可以發現字眼當在“結”字，指“恩”能進入人的生命，使受恩的他者存有感念，就是所謂的“可思”。因此，馬周反覆強調“務廣恩化”、“恩有餘地”、“恩加於人”等說法，讓積德日“深”、恩“結”人心，產生愛如父母、仰如日月、敬如神明的情感連結。如此看法，也見於魏徵的言說。如貞觀十一年時因狎近閹宦妄奏，魏徵即上疏說：“以之為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為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⁹⁸同樣以“結”揭示情感兩方的連繫。

之所以有如此的關懷，如同魏徵所說：

夫君臣相遇，自古為難。……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寇讎。”雖臣之事君無有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薄厚，然則為人上者，安可以無禮於下哉？⁹⁹

“君臣共生”是《群書治要》主要關切議題，著重的是君與臣兩者的對待關係，擴大來說，乃思考與他者互動的問題。透過魏徵的表述，可知君臣雖有尊卑、上下必然的秩序關係，但是客觀規範僅有消極防過作用，想要尋求積極體現“去就

⁹⁷ 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頁 357—358。

⁹⁸ 同上注，頁 292。

⁹⁹ 同上注，頁 403—404。

之節”的人文價值,就必須踐行“禮”,以合宜的對待方式,在“恩結人心”後,才可能達成。由於太宗對魏徵的信從,力行仁義的結果,如《貞觀政要》所載: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早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纔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咸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¹⁰⁰

在“霜早”、“饑饉”的天災,突厥侵擾的外患下,唐初時局動蕩不安,百姓若怨聲載道,當為常情。但此刻百姓雖東西逐食,卻能自安而無怨怒,“竟無一人逃散”此當有可說的感人緣由。文中以“得人心”,作為推崇太宗的用語,但也正指出了銳精為政時,遵行“仁義為治”,收取“恩結人心”的成果。

2. 內證:《群書治要》的“屈己得人”觀

分析“華元食士”的敘述,最直接的反映是征戰情境中主從的問題。順此以觀《群書治要》,得見諸多相近的敘事。舉個同樣是截錄《左傳》的故事,以明其意: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頁90)

此則收錄的內容,與“華元食士”呈現的樣貌正好成對比。因為天寒地凍,士氣必然低落,楚王順巫臣的提醒,能以具體“拊而勉之”的作為,與軍士交心,故能達到受人慰勉而感到溫暖“挾纊”的效果,取得戰爭的勝利。《群書治要》選錄之黃石公《三略》亦有言:

夫將(師)[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昔者良將之用

100 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頁51。

兵也，人有饋一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頁 980）

同樣是將領與士卒的互動情境，指出一位能夠讓士兵赴湯蹈火、克敵制勝的良將，必然是能夠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而存在此種感受乃來自於“及己”的具體舉措。《群書治要·六韜》更明白解析此間將士情感結交的情形，《龍韜》說：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為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禮。冬日不服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蓋幕，名曰三禮也。將身不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下步，名曰力將。將身不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故上將與士卒共寒暑，共飢飽、勤苦。故三軍之衆，聞鼓音而喜，聞金聲而怒矣。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非好死而樂傷，為其將念其寒暑之極，知其飢飽之審，而見其勞苦之明也。”（頁 739—740）

樂生惡死，乃人之常情，如何能讓人無視死傷？武王所言親如父母，足為關鍵。然而，如何達成？太公認為將領能踐行“三禮”，就能夠與士卒締結深刻的情感，讓士卒爭先克敵。何謂“三禮”？文中言“三禮”為：“冬日不服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蓋幕。”以文意言，身為將領而能得士卒之心，必須是在“寒暑”、“飢飽”與“勤苦”三種切身之事上，傳達將領有“念”、“知”、“見”的共同體會。隨後《犬韜》又再截錄“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敵可勝也。”（頁 744）總之，此處亦是著重在“得人心”面向。

《群書治要·史記》記載吳起帶兵的方法，有這麼一段敘述：

吳起者，衛人也。魏文侯以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糧與士卒分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為吮之，卒母哭之。人曰：

“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不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死處矣，是以哭之。”
(頁 265—266)

吳起是戰國著名將領，藉此敘述當可理解克敵制勝之關鍵。敘述中書寫吳起在魏國帶兵打仗時將士互動的情形，從同食、分勞、不設席、不騎乘，已足以顯示吳起與士卒間的緊密關係，最後藉由對話形式，畫龍點睛的展現士卒的情感回饋。雖然，尚未知最後此卒的生死情形，但可預期的是在吳起體貼的舉措下，已收得人心，最終士卒亦將爭先殺敵以爲回報。

武經《三略》也說：

夫主將之法，務在於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者也；亡國破家，失人者也。是以明君賢臣，屈己而申人。(頁 979)

文脈以“主將之法”起，以“明君賢臣”終，足見兩者有相通的道理。爲將在攬英雄之心，爲君爲臣，也需要透過“屈己”的方式，在“得人心”下，國得以治，家得以安。《群書治要》又截錄荀悅《申鑑》的兩則言論，其一明“順”之道：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體順，二曰辭順，三曰事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順，則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辭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故足寒傷心，民憂傷國。¹⁰¹ (頁 1136)

此則論述，先言臣，後言民，故實包含君、臣、民三者的關係。在君臣關係上，從

101 本則論述《群書治要》校訂本視爲一則，天明本亦歸爲一則，但今本《申鑑》則分屬兩則，是有意合併，或是魏徵等人所據版本與今本異？有待新資料的佐證。

君主的立場，無不希望臣子能事事順從，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究竟如何才是真的融洽呢？此處，荀悅提出“治世之順”與“衰世之順”的區別，認為治世的“心順”、“職順”與“道順”等三順，才是“真順”，而衰世的“體順”、“辭順”與“事順”等三順，是“生逆”，適得其反的假順。從逆節、逆忠與逆道，可知此類假順，是形順而神逆。反之，可以推知所謂真順是內在價值的契合。由此可見，君臣互動關係上講求兩方內在的真實連繫。至於，上下之別，可以理解為居上的君臣與居下之民，在“足寒傷心，民憂傷國”的觀點下，上下為一體的關係。不過，雖是一體的連動關係，但在轉向對待關係思考後，為“得人心”，人際關係的經營，就成為一個重要的新課題。

《申鑑》另一則明天下之樂的意義：

或曰：“聖王以天下為樂乎？”曰：“否。聖王以天下為憂，天下以聖王為樂。凡主以天下為樂，天下以凡主為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之道也。”（頁 1135）

此處君王與天下可以視為互動之兩方，當“屈己”以成就天下人之樂，此刻得天下人之心，天下人將視其為聖主而回報之；反之，若“申己”以使天下人生憂，則天下人亦將視其為凡主而憂亦反報應到主之身。由此可見，從互動關係帶出的人際經營，成為唐代治國理政中矚目的焦點。

五、結 語

孔子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遷也說：“《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又說：“《春秋》以道義。”¹⁰²所以《左傳》敘事，在人事之中，也相映展現了價值的內涵。《群書治要》為求治國理政，講究簡易可

102 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見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宏業書局，1990年），頁1337。

行的道理,這種因事求理,在理與事的關聯上與《春秋》、《左傳》相仿。只是,《群書治要》面對著初唐正發生的課題,“稽古”中實有“振今”的現實意義。爲了在多數學者竭力挖掘《群書治要》的文獻學價值之外,彰顯其內在蘊含的時代觀點,本文嘗試選取其中一則截錄自《左傳》的“華元食士”故事爲探究對象,透過經典敘述的還原與歷史解讀的掌握,定位唐代觀看的視角,再據《貞觀政要》爲主所顯示的語境訊息,以及《群書治要》展現的相映觀點,明晰“華元食士”置於《群書治要》中所顯示的貞觀思想。

透過《春秋》與《左傳》的回歸,明晰了置入《群書治要·左傳》中“華元食士”敘述的原貌。依《春秋》所劃定的範圍,《群書治要》的《左傳》原始素材是以五大段落、三大層面來呈現,包含“補述經文”層面的第一段、“詳明敗績”層面的第二段與第三段、“打造華元”層面的第四段與第五段。五段皆具意義,並構成一完整的敘述。然而,《群書治要》偏取第一段與第三段文字作刪削,顯示其敘述中欲彰顯的事理與評價。

爲了掌握《群書治要》所關注的治要義理,本文藉由觀察“華元食士”的歷史解讀,明晰此變化的樣貌。從羊斟的解讀來說,可分爲“據德知義:無良敗國”、“見情察微:不知與有怨”與“依理推論:存疑不取”等三面向,其中藉由呂祖謙的解讀新意,溯源至唐代走入互動情境的觀看特點。由華元的解讀而言,與羊斟相應,從回護、肯定其賢者形象轉向審視、批判其不足,唐代以對待關係、互動情境展現新的見解。就狂狡的解讀來說,孔穎達承先啟後的作用,映照出唐代重視行爲合理合宜的詮釋判準。

掌握了唐代視角的不同,爲了明晰《群書治要·左傳》之意已不同《左傳》,本文首先以定焦“華元食士”,說明《群書治要·左傳》的取捨,尤其透過“焦點轉移”,解讀自《左傳》“羊斟敗國”說轉變爲“華元食士”的意義;其次,以《貞觀政要》之“惠下廣施”觀的語境外證,結合《群書治要》之“屈己得人”觀的編纂內證,闡明《群書治要》截錄《左傳》文本的貞觀視角與應用詮釋觀。

綜上所述,可知《群書治要·左傳》中“華元食士”的敘述文句雖與《左傳》無異,但刪削取捨後置入《群書治要》,其意蘊已在新的組合中隱含新視角而有

新意。以小見大,推而論之,《群書治要》並非只是六十八部文獻內容的移植,更不是經典文義的濃縮,而是魏徵等人扣緊於初唐時期展現觀點的一部“以編代作”的作品。

(作者: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後助理研究員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引用書目

一、專書

毛公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

王溥:《唐會要》。京都:株式會社中文出版社,1978年。

王應麟:《玉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臺北:天工書局,1993年。

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呂祖謙:《左氏傳說》。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呂祖謙:《左氏傳續說》,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呂祖謙:《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李石:《方舟集》,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4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李明復:《春秋集義》,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

金光一:《〈群書治要〉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

柳宗元:《柳河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胡安國:《胡氏春秋傳》,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1。臺北:臺灣商務

- 印書館,1986年。
- 范寧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
- 孫復:《春秋尊王發微》,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孫覺:《春秋經解》。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島田翰:《古文舊書考》。臺北:廣文書局,1967年。
- 祝穆輯,富大用輯:《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
- 許維禛:《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陸淳編纂:《春秋集傳辯疑》。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黃震:《黃氏日抄》。京都:株式會社中文出版社,1979年。
-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葉夢得:《葉氏春秋傳》,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葉適:《習學記言》,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9編)》,冊9。鄭州:大象出版社,2018年。
- 聞一多:《聞一多全集·唐詩編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
- 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 劉晝著,傅亞庶校釋:《劉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劉敞:《春秋權衡》,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劉敞:《劉氏春秋傳》,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劉肅:《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樓鑰:《攻媿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潘自牧編纂:《記纂淵海》。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鄭玄:《箴膏肓》,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臺北：學海出版社，1985年。

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魏徵等編撰，《群書治要》校訂本編輯委員會校訂：《群書治要》校訂本。北京：中國書店，2014年。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宏業書局，1990年。

二、論文

吳金華：《略談日本古寫本〈群書治要〉的文獻學價值》，《文獻》2003年第3期，頁118—127。

林朝成：《〈群書治要〉與貞觀之治——從君臣互動談起》，《成大中文學報》第67期(2019年12月)，頁101—142。

林朝成：《〈群書治要〉與貞觀之治——以“牧民之道”為例》，《成大中文學報》第68期(2020年3月)，頁115—154。

林溢欣：《從〈群書治要〉看唐初〈孫子〉版本系統——兼論〈孫子〉流傳、篇目次序等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1年第3期，頁62—68。

林溢欣：《從日本藏卷子本〈群書治要〉看〈三國志〉校勘及其版本問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3期(2011年7月)，頁193—216。

林溢欣：《〈群書治要〉引〈吳越春秋〉探微——兼論今傳〈吳越春秋〉為皇甫遵本》，《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9年第1期，頁19—23。

邱詩雯：《治要與成一家言：論〈群書治要〉對〈史記〉的剪裁與再造》，《成大中文學報》第68期(2020年3月)，頁43—72。

張瑞麟：《〈群書治要〉選編〈墨子〉的意蘊：從初期墨學的解讀談起》，《成大中文學報》第68期(2020年3月)，頁1—42。

張瑞麟：《轉舊為新：〈群書治要〉的編纂與意義》，《文與哲》第36期(2020年3月)，頁1—54。

張蓓蓓：《略論中古子籍的整理——從嚴可均的工作談起》，《漢學研究》第32卷第1期(2014年3月)，頁39—72。

黃麗頻：《論〈群書治要〉對〈老子〉的取徑與實踐——以貞觀之治為證》，《東華漢學》第31期(2020年6月)，頁1—31。

劉德明：《程頤學派對齊桓公的評價——以程頤、謝湜與胡安國為核心》，《成大中文學報》第56期(2017年3月)，頁1—36。

潘銘基：《日藏平安時代九条家本〈群書治要〉研究》，《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7期(2018

年7月),頁1—40。

潘銘基:《〈群書治要〉所載〈孟子〉研究》,《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16輯(2018年8月),頁293—317。

潘銘基:《〈群書治要〉所錄〈漢書〉及其注解研究——兼論其所據〈漢書〉注本》,《成大中文學報》第68期(2020年3月),頁73—114。

嚴靈峰:《定州竹簡〈文子〉殘本試探》,《哲學與文化》24卷第2期(1997年2月),頁98—106。

**The Reception of *Zuozhuan* and the
Zhenguan Perspective, as Revealed in
a Citation of “Hua Yuan Feeding His
Soldiers” in the *Qunshu Zhiyao***

Chang, Jui-Lin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Lin, Chao-Che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Qunshu zhiyao* is an anthology compiled by Wei Zheng (580 – 643) and his team in 603. Does this book embrace any specific ideology? If so, how should one ensure understanding of such an ideology? According to the preface to the *Qunshu zhiyao*, Wei Zheng intended to compile an anthology that would differentiate itself from two predecessors, the *Huanglan* and *Bianlue*. By laying emphasis on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he aimed to reveal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events in order to illustrate governing principles and provide practical solutions to contemporary issues. Therefore, the book was intended to uncover the implicit interpretation of the editors of the sources from which he excerpted the texts that became the entries of his compilation. Practicality is one such key principle. The present article discusses a *Zhuozhuan* narrative on “Hua Yuan Feeding His Soldiers” anthologized in the *Qunshu zhiyao*, contrasting the perspective and meaning in this excerpt in the Tang compilation with the *Zhuozhuan* original context.

This article has three goals: (1)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riginal *Zhuozhuan* and its edited version by means of restoration of the original status of the classic; (2) to reconstruct the Tang preferences of interpretation through collecting and surveying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narrative on “Hua Yuan Feeding His Soldiers”; and (3)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s of “Yang Zhen Causing Downfall of His State” and “Hua Yuan Feeding His Soldiers” to discover how the ideology embedded within was intended to be justified and illuminated in light of the context of the *Zhenguan zhengyao* and the editorial principles of the *Qunshu zhiyao*.

The present study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narrative on “Hua Yuan Feeding His Soldiers” centers on “winning people’s hearts” and “humbling oneself to win support from people.” The former reveals human affections while the latter concerns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While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Qunshu zhiyao* reflects ideologies of the Tang dynasty, there is also a clear attempt by the editors to proclaim their interpretations when selecting excerpts from ancient classics rather than writing new works. Therefore, comparative and interpretative study of these texts is essential in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ology of the *Qunshu zhiyao*.

Keywords: *Qunshu zhiyao*, “Hua Yuan Feeding His Soldiers”, *Zhenguan zhengyao*, *Zuozhuan*, Wei Zheng